

人口问题的再思考

——与陶然博士商榷

杨国群, 张东峰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大连 116025)

摘要: 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 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必须清晰, 在目前新的形式下笔者仍然认为马寅初先生关于中国人口过多必须要控制的观点是适用的, 因为人口的最终选择是经济发展状况的选择。

关键词: 两种生产理论; 人口数量; 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C9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3)02-0059-04

A Rethinking on Population Problem

——Deliberating with Dr. Tao Ran

YANG Guo-qun ZHANG Dong-fe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116025)

Abstract: The solutions to population problems have to be clear in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authors think that Mr Ma yinchu' viewpoint to control population growth is still applicable, because the ultimate quantity of popul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Keywords: two production theory; population quantity; population growth; economy growth

陶然博士与董先安博士在《经济观察报》2002年10月14日“观察家”《人口问题的另一种思考》对话中, 陶然博士提出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另一种观点: “马寅初先生关于中国人口过多, 必须要控制的观点, 在实行资本密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时代, 无疑是正确的, 但未必适应一切条件, 尤其是现在和以后的情况。”任何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相应的条件的制约, 不可能适应一切条件, 但马寅初先生的观点是否还适应现在和以后的情况呢? 本人不敢苟同陶然博士的观点, 基于真理越辨越明的精神, 提出几点商榷, 并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提

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两种生产理论

关于人口经济思想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核心: 社会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 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 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人口生产最终总是要适

收稿日期: 2002-11-26

作者简介: 杨国群(1978—), 男, 江苏睢宁人, 东北财经大学2001级硕士研究生。

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即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因为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可以看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有本质的差别。马尔萨斯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断定决定人类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得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的运动的论点。而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不是决定力量，是从属力量。所以说，中国的人口是否过多、是否需要控制是应由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来决定。

二、中国人口数量问题

(一) 中国人口容量

人口容量就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计算中国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计算既可使这一代人满意，也为后代留下发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极限；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仿真运算，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许多地区发展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角度不同、方向各异的分析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约为 15 亿人或 16 亿人左右，而超过 18 亿人到 20 亿人，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一些专家还根据不同的目标建立起最优人口模型，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是，就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资源利用最有效而言，人口数目约在 7 亿人到 10 亿人之间。也有少数人认为中国远期人口以保持 4 亿人为好。但我们从实际出发，在下世纪内要达到经

济上最优的人口数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可能做到的是在计划生育工作能够做得到而又尽可能满足群众要求的情况下，使下世纪中国最高人口数比 16 亿低得多些，以便为后代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1]。

(二) 中国人口和日本人口的简单比较

陶然博士举出日本和台湾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现在的人口并不是过多的，认为只要经济发展策略对头，人口问题并不是问题。但本人认为这种比较是缺乏分析的比较，只是一个简单的从人口数量、密度上的比较，而忽略了人口的素质、结构以及各国的具体情况。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就开始了工业化过程。当时的明治政府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同时，从江户时代（亦称“德川时代”，1603～1867 年）以来，日本就十分重视教育，造就了一批素质较高的劳动力队伍。因而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与制度能够很好的消化。日本人口的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出现了明治维新前后的“多生多死”、明治维新至战前的“多生少死”和战后的“少生少死”。而中国的人口变化尤其是建国后的迅猛增长并不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 20 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可以说中国人口出现今天的局面是人为的、文化的结果。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奇迹有学者总结了八条因素：（1）战败因素；（2）美国因素；（3）科技因素；（4）资本因素；（5）资源因素；（6）市场因素；（7）政治、政策因素；（8）人的因素。其中人的因素可以说是个基础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¹ 从明治维新前后以来，日本就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使国民的素质得到普遍的提高；^④在战前的工业化过程中，造就了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这种丰富的工业化人才资源在战后不仅基本上保存下来，而且出现了人才资源从军事工业部门向民用工业部门的大规模转移，成为对引进

技术进行吸收、消化、改良的最重要基础。(四)战后日本实行重视“注重山脚比注重山顶更重要”的教育方针,注意面向本国的需要,生产实践的需要,培养大批能够扎根于国内,扎根于生产实践的工业化人才^[2]。

解放后中国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工业化是一片空白,中国的人口是纯粹的农业人口。日本的发展正如前面所述还有其他的因素,当然包括发展模式选择对头的因素,但我们应该看到它虽是在一片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但是战争却不能完全销毁它明治维新以来的工业化成果,这其中国民的素质,制度的建设等等都是它赖以发展的基础。中国的发展是真正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落后了人家百年的封建王朝的基础上发展的,而对中国人人口政策上又人为的犯了错误。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3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转变之前,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因为这一时期的生育转变是自然性的,社会发展是生育变化的决定因素;但随着人口政策的实施,行政性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左倾的错误”使马寅初先生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而是更有市场了。

三、中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

(一) 农村人口增长问题

现阶段中国人口增长的问题主要是中国农村人口增长问题。建国以来,中国的农业就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向国家提供积累。可以说农民是一直在为国家的工业化牺牲自己的利益。但这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3]。仔细分析一下现有的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我们就能发现,我们的就业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农业、非农业)、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农村人口增长。从宏观上看,

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无疑减少,农业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这种人口压力显然对人口增长是一种负效应;然而,从家庭层次上看,已经形成的农业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刺激人口增长的正效应通过全部自然就业的杠杆传递到家庭(多生一个可以多分得一份田地,人均耕地面积是减少了,但家庭总体耕地面积增加了),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励生育的正效应了。所以要解决农村人口问题,除了计划生育外还应从政策层面上解除一些潜在鼓励生育的制度。

(二) 中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为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曙^[4]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此外,王浣尘还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经济剩余之间关系为正值时,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才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他计算的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这一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数量控制的影响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5]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人口经济类型:A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B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C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

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9个省区；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新疆和海南4个省区；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西藏、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小结

中国将来会有7~8亿劳动力，我们把世界的制造业都拿来，还不足以满足几亿农民进城需要，5个亿的农村劳动力目前闲着的农民就有1.4亿。中国现在每年新生儿1600万，育龄妇女一年就能生下一个澳大利亚，新增人口的消费需求每年就需要经济至少增长4个百分点，低于4个百分点人们的生活水平就要下降。可想而知人口的压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压力是多么的大。所以在当前甚至在以后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人口对于我国的经济状况而言仍是过多的，仍是需要严

加控制的。这既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所要做的是不失时机地改进原有的计划生育控制机制，建立起由行政调节机制、经济调节机制、社会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为主体的新的工作思路。诸如改进户口管制，推进城市化，加强对妇女的教育等等措施无疑都能对降低生育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的现象将阻碍我们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失业与空位的矛盾会越来越激化。因为中国发展制造业虽然能够产生众多的就业机会，但能达到产业工人的要求的劳动力却不足。可以说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最长远的最根本的措施应是——发展教育！

参考文献：

- [1] 陆杰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人口与经济, 1999, (6).
- [2] 冯昭奎. 日本经济.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3] 翟振武. 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J]. 人口研究, 1991, (4).
- [4] 张世晴. 中国人口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M]. 中国人口科学, 1992, (4).
- [5] 李竞能. 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王树新]

山东寿光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捐助金”

山东省寿光市计划生育系统在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创建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捐助金”。该项捐助金自运作以来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好评。

“人口与计划生育捐助金”的宗旨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筹资渠道是向社会各界公开募捐，接受大企业、国际捐赠等。目的是解决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户中弱势群体的突发性事件和为“特困户”脱贫致富提供资金来源。

这项捐助金自立项到实施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捐助金”的使用和发放也是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实施，层层成立理事会，按规定章程由理事会讨论、决定资金发放的日期和次数。经过半年的运作，已为全市230户实行计划生育的“特困户”解决了燃眉之急，发放捐助金20万元。

(侯佃华 张少勇)